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吴怀中

内容提要：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关键词：战略外交 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 影响评估 对策思考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4) 01-0046-24

安倍自2012年底重新上台以来，从出访东南亚开始，总共到访近30个国家，累计举行110多场首脑会晤（参见表1）。^①安倍内阁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副首相麻生、外相岸田和防相小野寺等三相^②的足迹也遍及五大洲的近30个国家，举行百多场次的高层会谈。^③安倍内阁推动的这种外交活动，从地理范围来看，覆盖五大洲，但重点区域是东南亚及南亚、中东西亚、非洲、

^① 包括参加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及“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等来访的各国首脑。这两次安倍政府主导的多边会议，在日本年度外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广义上说，安倍推动的“战略外交”既包括“出访”，也包括“来访”。同时，对美外交虽然也应是其中的一环，但囿于篇幅，在此不作重点论述。另据日本《产经新闻》2013年12月23日报道，由于遂行这种大规模的“地球仪外交”，到2013年12月22日为止，安倍已把全年（指财年，到2014年3月）的外访住宿预算花光，以至于预定2014年1月对中东、非洲和印度等的访问需要从其他预算中挪用筹措。

^② 以安倍为首，加上他们可被称为安倍内阁的“涉外四相”，相当程度上代办了政府的外交权力和活动。以下所论述的安倍内阁“战略外交”行为，狭义上也是指这四相的活动及效果。

^③ 据笔者初步估计，2013年，外相岸田出访近15国，防相小野寺出访近10国，副首相麻生出访三国左右。高层会谈对象则包括到访的外国政要。

表1 2013年安倍出访国家一览表

时间	出访国家	主要议题	签署文件 (或重要宣言、声明)
1月16~ 19日	越南、泰国、 印尼	海洋安全、强化经济合作、强化与东盟的伙伴关系	在印尼发表《对东盟外交五原则》；“第二轮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JENESYS2.0)发表
2月21~ 24日	美国	日美关系(安保), 亚洲局势(中国、朝鲜、与韩国的合作), 经济(TPP、能源等)	《日美共同声明》
3月30~ 31日	蒙古	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安全领域的日美蒙三国政策对话框架、朝鲜问题、日中关系)	
4月28~ 30日	俄罗斯	安全保障, 缔结和平条约, 国际局势(俄罗斯在亚太角色、朝鲜), 经济(能源、远东及西伯利亚开发)	《日俄联合声明》、《关于运输领域合作的备忘录》、《关于能源领域合作的备忘录》等九项文件
4月30日~ 5月4日	沙特、阿联酋、 土耳其	开启“经济外交”(能源、扩大经贸合作、原子能技术出口), 地区安全	沙特:《包括强化伙伴关系在内的日沙共同声明》; 阿联酋:《日阿两国面向繁荣与稳定强化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 土耳其:《构筑战略伙伴关系的日土共同声明》、《原子能协定》
5月24~ 26日	缅甸	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对缅甸民主化进程提供全面支持、地区局势及防卫政策(缅甸是东盟2014年轮值主席国)	《日缅共同声明》
6月15~ 20日	波兰(V4〔波 兰、捷克、匈 牙利、斯洛文 尼亚〕+日本 首脑会议), 英 国(参加八国 首脑峰会), 爱 尔兰	波兰: 强化防务合作,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支持日本入常, 经济(再生能源、核能发电); V4: “价值观外交”, 安全保障(东亚与欧盟安全的关联性、海洋秩序、对东亚武器出口限制); 英国: 与G8经济关系、支持日本在处理被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的立场、建议设立两国首脑热线; 爱尔兰: 在安全领域加强与欧洲合作、支持日本在处理被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的立场	《日本与V4共同声明》

7 月 25 ~ 27 日	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	马来西亚：安全保障（两国海上保安机构合作、防务交流）；新加坡：强化与东盟关系，经济（TPP、RCEP），南海问题，日本修宪；菲律宾：ODA，加强海洋安全合作（提供舰艇），南海问题，朝鲜问题，日本修宪	新加坡：发表演说《进一步发展日本和东盟的双赢关系》
8 月 24 ~ 29 日	巴林、卡塔尔、吉布提、科威特	强化与中东各国伙伴关系，经济（能源、技术合作），海盗问题（派遣自卫队）	《G20 圣彼得堡首脑峰会宣言》
9 月 5 ~ 6 日	俄罗斯（参加 G20）	为东京申办奥运会进行声援和公关	
9 月 7 日	阿根廷（国际奥委会全会）		
9 月 23 ~ 28 日	加拿大、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	加拿大：亚太安全，经济（TPP、日加 EPA），强化在北极地区合作（加拿大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朝核问题，中国（日中关系是日本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从大局着眼处理日中关系，对话大门永远敞开）；联大：积极参加根据《联合国宪章》进行的集体安全保障活动，日本人常	在第 68 届联大发表演讲
10 月 7 ~ 8 日	印尼（参加 APEC 峰会）	TPP、RCEP、以 WTO 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	《关于核能及科学技术领域合作的共同宣言》
10 月 9 ~ 10 日	文莱（参加东盟系列峰会）	海洋安全，南海问题（以国际法为原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0 月 28 ~ 30 日	土耳其	安全保障、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核能	
11 月 16 ~ 17 日	柬埔寨、老挝	柬埔寨：安全保障（防务合作），经济（ODA、企业投资），南海问题，朝鲜问题，安理会改革和日本人常；老挝：安全保障（安全领域对话），ODA，海洋安全，安理会改革和日本人常	

注：截至 2013 年 12 月，安倍共出访 25 个国家，重访只统计一次。

欧亚大陆^①；从对象国的类别属性来看，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从重要度来看，分为在地缘战略、安全保障、经济利益（含资源能源

① 安倍内阁的上述“四相”虽然都没有出访非洲，但 2013 年 5 月日本作为东道主举行了第五届日本非洲发展会议。并且，安倍已计划于 2014 年 1 月访非。另外，安倍本人 2013 年虽然没有出访另一重要国家印度（已预定 2014 年 1 月访印），但印度总理访问了日本，日本天皇、麻生副首相及岸田外相等要人也分别访印。日本和另一重要关系国澳大利亚之间，则有首脑、外长之间的多次会晤。

等)、政治票田等各有权重的国家;从对象国与日本的关系来看,包括同盟国、友好伙伴国、新伙伴国、一般关系国等;从涉及的议题来看,囊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从开展方式来看,有“高大全”的特征,即层次高、规模大、手段全。一年多时间里,安倍内阁确实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其在年初提示的“战略外交”^①(或曰“俯瞰地球仪外交”)构想。安倍“战略外交”的蕴含及其实施,正对日本国家战略走向以及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一 安倍“战略外交”的梗概及背景

“外交”主要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而使用各种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和事务的活动和过程。^②安倍的“战略外交”是一种外交的方式(不是安倍的“外交战略”),是实施对外政策的系统筹谋和综合手段,其最大的公约数概念应是指“在战略的指导下有效开展的外交体系行为”。所以,出于研究需要,首先要搞清安倍的这种对外战略的含义,但主要的还是应重点关注在战略指导下实施的这种外交的行动和过程,诸如其围绕的目标、实施的手段、行为的特点以及对华的影响等等。

一般认为,安倍在2012年12月26日就任首相的记者会上已提出近似于“战略外交”的说法^③,但对外公开正式使用“战略外交”一词,则是其上任后首次于国会发表演说之际。在2013年1月28日发表的这场演说中,他提出:“外交的基本是,不仅要注视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还要像俯瞰地球仪那样眺望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展开战略外交。”^④随后,2月28日,在国会进行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又表示:“战略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保卫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我外

^① “战略外交”对应英语的“strategic diplomacy”,中国国内也有“战略性外交”等译法。“战略外交”有时也被安倍等称为“俯瞰地球仪外交”,两者可被视为同一概念。

^② 参见陈志敏等编:《当代外交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0页。

^③ 安倍表示:日本面临日中、日韩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等重大课题,“包括美、俄、印、东南亚等在内,有必要以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考虑战略,战略性地开展作为综合力量的外交”。参见:「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就任記者会見」、2012年12月26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2/1226kaiken.html。

^④ 「第183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13年1月28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交的基本。”^① 而岸田外相在同日进行的国会外交演说中，又从职权范围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战略外交”的内涵。^② 之后的 2013 年里，安倍及其内阁成员又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言及“战略外交”。

总结以上各讲话内容以及安倍内阁一年来的外交活动，可以大致勾勒出安倍“战略外交”的面貌。从广义上讲，它可以包括以下三层内涵（狭义为第一和第二层）。第一，对外交战略进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宏观设计和长远规划；第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实施这一战略，达成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三，为达以上目的，改善内部体制机制，构筑最优的外交实施基础和保障态势。这种架构的具体内涵则如表 2 所示。

表 2 安倍“战略外交”结构示意图

规划战略	国家利益界定：日本国及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价值。
	国际形势判断：(1) 权力转移，多极化，“西衰东盛”；(2) 全球问题严重，安全环境严峻复杂。
	外交目标制定：(1) 维护西方主导体系；(2) 应对新兴大国（中国）崛起；(3) 维持并增进日本的政治地位、经济繁荣、安全保障。
组织实施	实施路径选取：强化日美同盟、地区双多边合作（特别是友好伙伴合作）、“价值观外交”（与“共同价值观”国家进行友好合作）、经济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贡献等。
	外交贡献：主要指参与广义上的全球治理，包括裁军及军控、反恐与防扩散、地区一体化、危机管理、国际公域管理、气候环境、国际维和等。
	经济合作：投资、贸易、ODA、减免债务、TPP、RCEP、中日韩 FTA、日欧 EPA 等。
基础保障	安全合作（积极和平主义）：双多边传统安全合作、维护“国际公域（海空天网与极地）”安全、协助解决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防务合作（协助能力建设、武器出口）等。
	社会介入、文化传播：“人类安全保障”、医疗保健、教育及人才培养、防灾救灾；提升软实力及国际形象的各种对外文化传播和渗透。
基础保障	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改革并扩充外务省组织（包括增设使领馆等）、增加相关预算（包括 ODA）、制定“保密法”、设置各种战略及政策咨询机构等。

一般而言，任何一国开展的外交，本来就应该具有战略的外交或战略性的外交，而非反向而为。如果安倍内阁刻意强调日本要开展“战略外交”，

① 「第 183 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13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jimin.jp/policy/parliament/0183/120157.html>。

② 「第 183 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2013 年 2 月 28 日、<https://www.jimin.jp/policy/parliament/0183/120153.html>。

那无非说明其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外交缺乏“战略性”（包括设计与实施两大环节），同时又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认为需要革新改进。实际上，安倍的“战略外交”在2013年得以全面开展，主要也是出自于以下四个与此有关的背景因素。

（一）与国际形势带来的深刻变化有关

安倍在谈及“战略外交”时，曾反复强调首先要像俯瞰地球仪那样眺望整个世界。所以，跳出双边、总览整个世界大势，是安倍构思和推进其“战略外交”的认识前提。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从美国深陷伊、阿两场战争开始，到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格局及权力分布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1）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动和挑战，美日欧的实力和影响相对下降，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权力转移与多极化趋势明显，世界开始多极化，国际格局进入大变化和大调整的历史过程。（2）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不可避免，对日本来说，美国的“保护效力”既不能包打天下、也未必靠得住，很多问题已经难以通过单独靠美国得到解决；而且，日本赖以“坐大”的经济优势更是不保，日本的实力和地位也在下降。（3）与以上两条相关，中国全面崛起，日本在各方面感受到巨大压力，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成了日本外交最重要的课题。

面对上述这些百年不遇之变，日本的政治精英终于痛彻地认识到，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工作也应随势应变，需要以战略筹谋和主动外交来创造局面，开辟出路。^①因而，不但像日本外务省在其“外交政策”宣传栏里、执政联盟公明党在其2012年众议院选举纲领中提出“战略外交”口号^②，就连在野党大家党在其2013年参议院选举纲领中，田中均、添谷芳秀、孙崎享这样当前的非主流派精英在其著述中，也都提议日本要推动“战略外交”。^③

① 以上认识的部分内容，在2013年12月17日安倍内阁公布的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到了反映。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7/20131217-1_1.pdf。

② 外務省「日本外交政策」、2013年12月、<http://www.mofa.go.jp/mofaj/comment/faq/gaiko/seisaku.html#top>。

③ 田中均「戦略的外交を展開するチャンスが来た」、2013年7月26日、<http://www.jnpc.or.jp/files/2013/07/ce14bab78d3465d8af62fe14aadfefb8.pdf>。添谷芳秀「新政権の課題（3）中国の台頭と東アジア外交」、2013年1月23日、<http://www.nhk.or.jp/kaisetsu-blog/400/144918.html>。

（二）与安倍的国家战略志向有关

安倍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点就是谋求日本全面振作崛起、不做“二流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社会中要有操盘的主导权。^① 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政治精英集团，对日本的国家定位和前景都有相同的认知，即具有高度一致的“大国志向”，主张日本要有信心成为政治大国，保持“国际社会主要玩家”的地位，^② 同时，他们也认为，在未来 20 年内，日本在全球仍然拥有名列前茅的技术、资金及软实力优势，综合绝对实力并不弱，完全有作为世界性大国的条件和资格。

安倍的视野，正像他所宣示的“俯瞰地球仪”那样，开始带有通盘的、相对的、自主的眼光和考虑，想通过“经略全球”搞活“战略挪腾”，为日本开创更大的独立天地和发展空间。为此，安倍认识到必须要大力强化和改善外交工作，要“拼外交”，即首先要从大处和高处着眼考虑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的整体设计，其次政府要以一元化体制、采用综合配套的手段来强有力地实施这种战略。此两点，就是“拼外交”的内涵，目标则是用“外交之力”来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弥补日本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力量的下降，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具体而言就是：（1）以外交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衰退，围绕确保安全、维持繁荣、增进地位（政治大国），以多边和地区外交为舞台，在全球治理、经济发展、国际和平合作、裁军及军控、反恐与防扩散、地区一体化、危机管理及防灾救灾等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履行大国职责，确保日本仍可以在国际上维持“主要玩家”的地位和影响力。（2）为了达成第一的目标，日本还需要主动参与构建对日本有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这个秩序含有“安全、繁荣和价值”理念的三大内容，即市场经济及自由贸易体制、西方民主主义价值体系、以美国主导的同盟安全架构。携手西方发达国家、鼎力协助力不从心的美国，来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被认为是日本外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全局性课题，其最终目标，

^① 安倍 2013 年 2 月 22 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的题为《日本回来了》（“Japan is back”）的英文讲演中，高调表明“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做二流国家”。参见日本首相官邸网，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其后，《纽约时报》网 2013 年 10 月 25 日报道称，安倍表示要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袖，参见《安倍放言日本要当亚太地区领袖》，新华社 2013 年 10 月 27 日电。

^② 在日本首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国际社会主要玩家”一词被屡次提及。另外，日本学者北冈伸一的著述即以《作为全球玩家的日本》命名，北冈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起草者之一。

是把新兴国家吸收融合进来并使之按“体系规则”行动。^①

(三) 与日本外交固有的缺陷和问题有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外交的战略性和自主性不够。二战后的日本，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曾长期被认为缺乏国家战略及外交战略。冷战下的两极格局、冷战后的一超霸权，都使日本的外交严重受制于美国，无法独立作为，只能以日美同盟为前提来考虑对外战略。(2) 外交的手段欠缺。“和平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使用军事手段介入国际安全义务并发挥作用的途径。因而，安倍们认为，日本开展的多是单一的“经济外交”，而非手段丰富的、含有“军事外交”措施在内的“战略外交”。(3) 内政的消极与负能量作用。由于政局混乱、政权更换频繁等原因，日本外交政策缺乏宏观设计、系统性及连续性。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转折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外战略及外交工作常常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和嘲笑。出于以上三大原因，在外界的客观评估中，日本的外交力量所得“评分”历来不高，不但远低于美国和中国，而且也低于英、法、德等国，与世界主要大国有明显的差距。^②

现实中，民主党外交的“乱象”，日美关系不畅，日中、日韩之间问题频发，使安倍认为近年的日本外交是（包括日本国内战略界和舆论）“受伤外交”、“外交失败”、“外交危机”。外交跟不上“形势”需要，改革这种局面已成了自民党重新上台后的政权共识。例如，安倍在上台之初就宣示要“重建外交”^③——包括对外交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指导、强化政策基轴、调整目标和指向、充实外交手段等^④；岸田外相 2013 年 2 月在第 183 届国会进行“外交演说”，表示“要对外交实施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强化”、“强化外交是现

① 以上内容的总结，参照了《国家安全战略》及《防卫计划大纲》的形势分析部分、外务省形势分析参考资料《我国周边的外交、安全保障环境》（2013 年 9 月 12 日）、安倍演讲以及谷内正太郎和兼原信克等的相关著书。

②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日本外交力量被排在第七位，与前六位有明显差距。

③ 安倍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就任首相记者会上的讲话、2013 年 1 月 28 日在众议院的演说、2013 年 2 月 28 日在众议院的施政演说等内容当中，均含有这方面的内容。

④ 这些方面具体包括：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并制定统筹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国家安全战略》，使外交更多地为经济和贸易服务，使安全保障及防务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和正面话题，使政府开发援助具有更多战略性，等等。

内阁的重要课题”^①；2013年5月，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外交部会通过“要求加强外交实施体制的决议”^②，递交安倍内阁。

（四）与安倍所受“智力支持”有关

安倍虽在2013年1月的国会演说中首次提出“战略外交”口号，但对战略性地实施日本外交早有“知识储备”。早先的重要智囊冈崎久彦的著述、安倍本人与冈崎的对谈集，以及与其素有瓜葛的日本国际论坛的系列研究成果，都曾涉及日本外交的“战略性”问题^③，因此，安倍对谈论“战略”和接受“战略”本身并不缺乏感觉。不过，正如上述，当前安倍高调提出的“战略外交”口号，显然主要是受到了谷内正太郎、兼原信克等几位身边高参的影响。兼原的著作《战略外交原论》即直接以“战略外交”命名，而谷内的《外交的战略与志向》、《日本的外交与综合安全保障》等书中，也不同程度地提到“战略外交”或“外交战略性”的问题。^④按照经典的政治过程、决策过程及决策学理论的分析，安倍的执政及决策范式属于典型的“小集团主导型”，即严重依赖身边的政治小集团、核心智囊人士以及少数财界精英。^⑤安倍身边有思想、战略、政策倾向各不相同的几个智囊派别^⑥，但在外交及对外事务上，为其出谋划策的，多是谷内、兼原、北冈等一干人士^⑦。这些智囊多以研究和阐释日本对外战略见长，他们究竟对安倍有多大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但对其思考和想法经常担负劝导、加工、提炼、包装和宣介的角色，则至少应该是某种事实。^⑧

① 「第183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2013年2月28日、<https://www.jimin.jp/policy/parliament/0183/120153.html>。

② 「外交実施体制の強化を求める決議」、2013年5月29日、https://www.jimin.jp/policy/policy_topics/pdf/pdf108_1.pdf。

③ 岡崎久彦『戦略的思考とは何か』、伊藤憲一『21世紀日本の大戦略』。

④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谷内正太郎『外交の戦略と誌』、『日本の外交と総合的安全保障』。

⑤ 参见王鸣鸣：《外交政策分析：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⑥ 一般认为，在安倍身边，有意识形态派、战略派、务实派和财经派等几大不同的智囊及建言群体。

⑦ 谷内、兼原的作用自不必说，就如北冈，尽管他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安倍的智囊，而且在历史认识及民族主义等问题上一直与其保持距离，但从其兼任多个首相咨询机构职务一事来看，其较为冷静的国家利益观和战略思考能力，仍然有被安倍所借重的部分。

⑧ 一般认为，不像中曾根康弘等战略派政治家，安倍本人并无很强的战略头脑，但安倍的“优点”是姿态低、耳朵软，不拒绝倾听别人的意见。

二 安倍“战略外交”的具体内容

外交是一门综合艺术和系统工程，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研究现代国家及政府的外交，往往需要从主体、宗旨（目的）、性质、形式和特征等多个方面来进行。鉴于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对外关系的特色，以下仅从外交目标及目的、实施路径和方法、外交行为特点等核心事项来揭示其“战略外交”的具体内容。

（一）主要目标及目的

安倍执政以来的主要外交目标，即在谋求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同时，在国际及地区范围内展开与中国较量和对峙的外交行动。这其中安倍谋求日本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和逻辑，但无疑也有对付中国的“韬略”在内。

1. 实施“大国战略”的一环

应该看到，安倍推动“战略外交”，首先是遵循自己的战略逻辑，配合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大国战略的实施。安倍除了着力推动“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经济外交外，还以其特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通过在全球拓展日本的外交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显示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存在感和影响力。^①安倍“战略外交”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服务的典型事例，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为“入常”造势拉票。随着安理会改革问题步入新阶段，日本瞄准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欲发起新一轮“入常”攻势。为此，安倍除了在9月联大会议、出访东南亚及欧洲有关国家时直接提示“入常”议题外，还借5月在日本举行第五届非洲发展会议之机，拉拢和分化非洲国家，为日本拉票站台；同月举行日印首脑会谈，又与印度高调表示要在“入常”问题上共同努力，建立一年两次的联合国事务对话机制；8月访问中东四国，除了能源外交，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显示日本“政治存在感”也是重要议程。其次，为走向军事大国做铺垫。安倍到处介绍日本的新安全防务政策，如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同时兜售其“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宣示日本今后将大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安全事务。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与北约（尤其与英法）、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的安全防务合作。安倍此举，无疑是在争取国际社会及周边国家理解其推动日本“国防正常化”和

^① 安倍的这种战略行为，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取得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及适当“脱美”的筹码。

“军事大国化”的努力。

2. 拉动增长，提振日本经济

日本近年来经济低迷，对通过加强对东盟国家、对非、对印、对俄合作，刺激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抱有较大期待。为了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增长战略，安倍“战略外交”的经济着眼点，即安倍“经济外交”的重心，除了兼有少部分呼吁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意图外，基本被置于争夺能源资源和市场（尤其是商品销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两大市场，这有助于扩大日本对外投资）这两大块上。例如，访问中东、俄罗斯乃至非洲、印度^①，主要是为了确保能源资源的外交；访问东南亚（缅甸等）、土耳其，主要是为了以“首脑推销”开拓和争夺市场，正如安倍自己在纽约证交所讲的那样：“几乎每个月都要开展的外访都带着商界领袖，推销日本产品”。^②其中，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是安倍内阁经济外交将核能和高铁出口作为重中之重加以推销。^③面对这种情形，经常陪同安倍外访的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曾自豪地表示：“日本经济正在上升，日本在海外的存在感也在提升”。^④

3. 改善安全环境

安倍在其“战略外交”的绝大部分议程中都加入了安全议题。日本从 2004 年起的三版《防卫计划大纲》以及 2013 年首份《国家安全战略》，都把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防止威胁作为确保日本安全的主要目标，并把国际及地区社会合作作为实施路径之一。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下，“国际安全保障”被安倍明确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前提和分内之事。其中，安倍尤其重视改善和确保对其来说比较重要的三大类安全环境：（1）全球及地区重大安全热点地区。例如伊核、朝核及叙利亚等问题，广义上也包括全球重要战略区的大中东地区等。（2）全球公域安全尤其是“海洋安全”。例如安倍内阁“四相”在全年举行的双多边外交会谈中，有一半以上的场合提及海洋安全议题，包括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涉海涉岛争端等。其中，日本特别重视地缘位置重要的海上通道，例如 2013 年内举行的日印、日澳、日本东盟

① 2013 年 5 月的日印首脑会谈，双方签署了《稀土合作备忘录》。

② 「ニューヨーク証券取引所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2013 年 9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925nyspeech.html。

③ 安倍除了与阿联酋签署以核电站出口为前提的核能协议以外，年内还两次访问土耳其，帮助日企联盟获得核电订单，同时还加强面向印度、越南和中东地区的核电出口。安倍政府还大力向越南、马来西亚和泰国推销日本的高铁。

④ 『産経新聞』2013 年 11 月 20 日。

等首脑会谈一致同意维护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和平解决海洋安全、应对海盗等共同挑战。(3) 全面应对“周边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这主要表现为使用合纵连横手法、构筑对华“统一战线”，意图在围绕中日争端的国际博弈中，对中国造成“软威慑”和战略压力。远到北约、近至菲越，大到俄印、小到柬老，都是日本拉拢用以制华的对象。

4. 对华较量及博弈

安倍“战略外交”，应该说处处都透着与中国较量的成分和意味。安倍不但要带领日本争当亚洲的经济安全领袖，2013年10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还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① 安倍上台以来推动的这些外交活动，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包围外交”或“环绕外交”——一年多来绕着中国走的同时也始终针对中国，明显意在牵制和包围中国，对中国形成“外压”，迫使中国以接受日本的主张为前提来进行对话和谈判。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和对峙的形势下，安倍欲借这种“环绕外交”增加与中国较量筹码、达成战略优势的用意十分明显。安倍智囊之一的八木秀次对此曾做过透彻的诠释：“战略外交的‘战略’所指为何？只要看看首相还没有到访或还没有举行首脑会谈的国家就明白了。我国的周边，有不立足于基本价值的大国，我国遭到其领土扩张和军事威胁。首相的外交就是为了包围这样的国家而开展的。”^②

安倍开展围华外交的手段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向中国外交基础较好的国家打“楔子”、搞“对冲”。其推出的大规模对非合作新举措，安倍和麻生两位正副首相等政要接二连三访缅，安倍作为日本首脑时隔多年访问蒙古、俄罗斯（安全对话）等，就属此举。^③ 二是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尤其是对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律宾和越南不惜施以援助，呼吁并支持它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④ 三是拉拢在意识形态和海洋

① 《安倍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制衡中国的准备》，新华社2013年10月28日电。

② 八木秀次「首相が進める戦略的外交とは」、2013年6月4日、<http://www.zakzak.co.jp/society/politics/news/20130604/plt1306040708001-n1.htm>。

③ 例如，安倍对非援助新举措，明显意在与此前的中非会议攀比，抵消习主席访非成果。其他对缅甸、蒙古、俄罗斯以及柬埔寨和老挝的访问，都有类似的“对冲”、“楔入”、“抵消”等目的在内。

④ 『日本経済新聞』2013年11月17日。

等国际公共利益上与日本容易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例如英、澳、欧盟等。^①四是进军印度、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和俄罗斯市场，以“中国 + 1”战略减少对中日经济合作的依赖，增加对华外交的主动权。

（二）实施路径与方法

安倍推动其“战略外交”的举措力度之大、动用手段之全，可谓创下二战后日本外交行为之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常常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安全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外交等路径来开展外交工作。在这一基础上，安倍“战略外交”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又有以下四种较为引人注目的主要表现形式。

1. 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

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全球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需要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同时，人类也离不开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是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谋求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获取全球影响力的便捷而合法的途径。正是看准了这条途径可以“公私兼顾”的优点，安倍内阁自成立起——从 2013 年初安倍和岸田外相在国会的演说，2 月安倍在美国智库 CSIS 的演讲，到 9 月安倍在联合国的演讲，再到 10 月临时国会上安倍再次进行的政策演说，及至年底最后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都重点强调“日本要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贡献，为创造更好的世界发挥作用”，“履行与世界大国相匹配的责任”等。^②具体而方，就是日本要在如下两在领域做出贡献：第一，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它包括：通过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及重建援助、国际公域的法治、裁军及军控、反恐与防扩散、国际维和（PKO）等。第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它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灾害、广义的“人类安全”问题等。

2. 利用“价值观”纽带

安倍首相、岸田外相等日本政要在政策演说中都高调表示要“立足于自

① 「日英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安倍晋三内閣総理大臣基調講演」、2013 年 9 月 30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128syosin.html。另外，2013 年 10 月，日本还积极促成日美澳部长级对话时隔四年后恢复举行。

② 「第 68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2013 年 9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6generaldebate.html。「国家安全保障戦略」、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7/20131217-1_1.pdf。

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展开战略外交”,^①把“价值观外交”作为“战略外交”的基础和重头戏。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年来,安倍几乎在所有的双多边首脑会谈中都要提及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到处推销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价值观外交”。不但如此,安倍还把这种口号落实到政策行动中,上台后他就公然主张建立包含美日印澳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这一(准)安全同盟来制衡中国。^②在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安倍提出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五项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共同创造相同的价值观”。此后对东南亚国家的访问中,他多次提出要“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遍价值观”。在整个西方推动的意识形态外交中,“价值观”推销既是目的,也是工具。日本一贯强调其目的性和正义性,在应对中国崛起冲击的过程中,为了突出“优势”、“以长攻短”,“价值观”有日益被“工具化”的倾向。^③很明显,安倍在推动其战略外交时,是非常重视“价值观”这一政治工具的。

3. 开展经济外交及经济合作

安倍在对外经济合作领域所下的力度和本钱,实为日本二战后外交手段之最。以经济合作及经济援助为主的经济外交,正是安倍“战略外交”拉拢各国、加速政治经济渗透并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外交手段。其举措,多为以下几种:一是直接提供政府资金援助,或免除债务。其中,ODA被视为实现“战略外交”的重要手段,为此,2013年安倍政府进一步强化了ODA的战略性分配,例如,在非洲发展会议打出的对非经济合作举措中的各种资金支持总额高达450多亿美元。近年,日本ODA总额呈现下降趋势,但此次却大幅提高对非ODA。对到访的非洲国家以及印度、缅甸、东欧国家、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安倍及日方政要皆承诺为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巨额的官方援助。2013年12月,在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安倍又“撒下”200亿美元。二是着力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同时为日本企业的出口和投资“整備”环境。例如,政府提供后援,帮助推销日本的技术、产品,包括民用核电、道路交通(高铁等)、城市生活等方面的设施。三是兴建或帮助建设工业园。例如,

① 「第183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

②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Dec.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③ 谷内、北冈、兼原等安倍的智囊都不同程度地主张利用“价值观外交”制约中国,因为这被认为是中国的短项。

援建印度的金奈—班加罗尔工业走廊项目、缅甸的迪洛瓦开发区等。

除以上紧盯经济实利的三点外，安倍“战略外交”还从长远出发，注重掌握国际经贸规则权问题，最典型的是强势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① 安倍内阁对此竭力推动，在国内困难重重、美国抬高要价的情况下，2013 年 3 月宣布日本正式参加谈判，7 月更是派出百人代表团正式加入第 18 轮谈判大会，成为 TPP 第 12 个参与国，并寄希望于 2013 年底前取得重大谈判成果。安倍显然将这一战略举措视为抢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的重要机会，至少也是想以日美引领亚太经济合作，凭此站在经济秩序制高点，有效吸取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

4. 推动安全及防务合作

安倍在其“战略外交”中加入了各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内容，在“积极和平主义”口号下，将保障“国际安全”、“共同安全”、“集体安全”作为该外交新的增长点和发力点。其合作方式或曰借助的名目，典型的有如下几种：一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做出国际贡献。例如，为非洲的维和、重建及打击海盗方面，不但出钱，而且出人。二是在全球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维护共同秩序或和平。特别是以海洋安全为议题，例如 9 月召开日本东盟 13 国海洋会议，又如加大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投入，与印、澳及东盟国家建立海洋合作及国防外交磋商机制，进行海军联合军演，等等。三是开展“防务合作”，帮助加强某些地区或国家“薄弱”的安全及防务能力。这主要指对日本安全利益具有重要性的国家——地缘政治上需要重视、又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周边国家，如菲律宾和越南等。^② 四是构筑一般性的安全对话机制。这似乎并无特定的针对目标，但其实都与中国有关，例如与俄罗斯建立“2+2”机制，与蒙古、柬老两国、土耳其、北约（英法等）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安全对话及磋商等。

5. 发挥社会性贡献

在安倍“战略外交”的对象国中，可以看到，从东欧、非洲、中东西亚，到南亚、中亚和东南亚，众多国家都面临经济社会转型，社会治理和民生问题突出。在这些方面日本有一些成功的治理经验，并且也有多年开展对外援

^① 除此之外，安倍内阁还大力推动与亚太、欧洲等地区的高水准经济合作战略，例如日欧 EPA、日澳 EPA 等的谈判。参见：「第 183 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外務大臣の外交演説」。

^② 2013 年 10 月的日美“2+2”会议联合声明表示，双方要共同加强有关地区及国家防务上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助的成熟机制和做法。安倍“战略外交”通过官民结合、以民促官、经营草根、深入民间的方式，常以社会性措施为抓手来增强该地区民众对日本的信赖和好感，以扩大日本影响、提升软实力和营造对日本有利的周边环境。例如，为非洲培养行政、产业、农技、教育等各领域的人才等，为东南亚落后国家提供教育、文化、保健、医疗及防灾救灾等方面的支援。^①过去，日本在提倡“人类安全保障”的理念下就曾向相关国家提供援助。2013年以来，日本先后对东南亚等国的自然灾害给予了紧急经济援助，11月菲律宾受超级台风袭击后，日本展开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自卫队海外派遣行动，用以赴菲开展救援活动。12月召开的日本东盟首脑峰会上，安倍还拿出巨额援助用于建设东盟防灾基础设施和培养防灾专家。^②

（三）主要外交行为特点

从一年多来安倍“战略外交”的实施过程中，可知其作为一种外交行为，至少具有如下四大特点。

1. 主动作为、积极谋划大战略

安倍的“战略外交”，是在全球战略格局调整、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美国“重返”亚太之际发生的，也是在中国加速崛起、中外关系虽稳中有升但错综复杂、中日关系未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种形势下，安倍以“战略外交”为“日本回归”和“绝不做二流国家”谋篇布局、投棋落子，在推动自主外交上明显加大战略投入和经营力度。对北约、欧盟各国、俄罗斯、东南亚、印度、非洲的外交，皆具明显战略性。可以看到，无论是为了实现自身大国战略，还是为了制衡中国、应对“中国威胁”，抑或为了适当“脱美自立”，日本以如此积极、活跃、主动且正面高调的姿态，在世界外交舞台亮相和活动，展开全球挪腾和战略经营，的确是二战后少见的。

2. 手段显有全面性、综合性与配套性

从以上可以看到，安倍推动“战略外交”，是以价值观为纽带、以经济（合作）为卖点、以安全为增长点、以社会性因素为着落点，采用综合配套的方式和手段来进行的。除了原有的经济手段外，包括“积极和平主义”大旗下的安全防务合作等新增举措在内，安倍外交的形式与手段已与世界主要大国所能动用的外交资源相差无几。另外，在安倍的“战略外交”中，“走出

^① 例如，日本国际协力事业机构（JICA）理事长田中明彦就亲自深入非洲大陆，考察项目和相关事业进展情况，指导具体工作。

^② 『毎日新聞』2013年12月14日。

去”的情况很多，“引进来”的例子也不少，如此则更有利于掌握议程及议题设置权，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2013 年 5 月的非洲发展会议、9 月的日本东盟 13 国海洋会议以及 12 月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都是其例。此外，安倍外交也相当注重内外统筹和体制保障，例如 2013 年 12 月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就是统筹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司令部；而为了支援日本企业出口设备以及投标工程，安倍内阁则不惜于 2013 年 11 月决定拨巨款成立新国营公司。

3. “随美起舞”与“借美出海”

美国对亚太实施战略“重返”和“再平衡”后，日本的地区乃至全球外交明显进入了一个活跃期。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长期以来以日美同盟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轴，美国对相关地区加大投入，为日本以“日美 + X”或“日本 + X”的合作形式“走出去”发挥作用提供了外来推力。从全球战略角度看，日本对非、对缅、对越菲蒙、对东欧等的外交，总体上也是美国甚至西方总体外交的一部分。美国重返后，安倍才能跟进缅甸、才能加大对东盟安全能力尤其是非越防务能力建设的援助，在全球范围内对冲和制衡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上升。同时，美国擅长“战略开拓”和“政治工程”，如在非洲、缅甸和东欧等，但常常“口惠而实不至”，后续的资金配套面临困难。日本往往是以经济跟进方式来助美一臂之力，如在上述区域和国家，日本都投下了资金方面的大手笔，起到了补美之短的帮衬作用。2013 年 1 月安倍、麻生和岸田对东南亚的集中出访，也被认为是尾随上一年底奥巴马、希拉里和帕内塔对东南亚的访问轨迹。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安倍也谋求尽量“不再从属于美国，与美平起平坐”，同时担负亚洲的领导角色。^①

4. 内外呼应与双向互动

应该看到，安倍“战略外交”的推动，也并非一厢情愿或“单相思”的行为。其主张或举措，有些是符合对方国家利益或诉求的，双方或多方当事国之间具有战略相望、地缘互助、经济互需、安全互保等关系特征。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快速上升，某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对华疑虑和防范也在上升，特别是还有些国家试图在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开展“平衡外交”，居中谋利。所以，客观上，日外关系是互有需求或相互借重的。例如，经济上，在当今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普遍对安倍打出的“经济大礼

^① 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文芸春秋』2013 年 1 月号、130 頁。

包”抱有一定程度的期待；政治上，日印在“入常抱负”等方面也有抱团取暖及相互借重之需；安全上，日本东盟、日印都需要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地缘战略上，在海洋或陆地与中国有争端的国家，也有和日本互相壮胆、共同制华的需要。^①

三 安倍“战略外交”的对华影响

安倍内阁在现阶段展开的“战略外交”，有其对外战略（乃至国家总体战略）上的通盘考虑，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针对中国的。这一点，就连日本官方和媒体也往往不加掩饰。不过，安倍在用其“战略外交”对付中国时，始终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价值观”上，都有难以随心所欲的短项。包括：政局不稳带来政策摇摆和间断，国力衰退及财政紧张导致力不从心，其他国家不会一味随起舞、为日所用，历史问题造成其军事受忌及道义缺失等等。^②因而，安倍外交中牵制中国的想法势必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尽管如此，从历史经验和民族性格来看，在想定战略、锁定目标的情况下，日本将战略图谋转化为“自觉行动”（尤其是其执着推进、攻其一点的思维及行动样式）的能量及破坏性仍然是巨大的。并且，现实情况又不得不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与警惕。这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历经金融危机和国力对比逆转之后，围绕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历史认识、安全保障等问题，中日矛盾全面上升并激化，进入一种类似“综合并发症”的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戒备、对抗和防范意识进一步加剧，中国被认为是“日本外交最大的课题”。但是，就如日本政治主流和精英层承认的那样，日本一国或即使加上日美同盟无法应对中国的崛起^③，日本必须要通过“合纵连横”的串

^① 菲律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总统和外相对到访的日本外相岸田表示，欢迎强大的日本为维护地区安定发挥平衡作用。参见：「東南アジア、安倍外交を歓迎 米の戦略補完、対中バランスの役割担う」、「産経新聞」2013年1月15日。

^② 例如，2013年11月，日本与俄罗斯举行了首次外交防务部长级会议（“2+2”会谈），但日本欲牵制中国的姿态在会议中遭到了俄罗斯的抵触。在12月14日举行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尽管日方多头公关，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并没有写入批评中国防空识别区的内容。同时，安倍身上挥之不去的“历史认识”问题及民族主义者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其“道义感召力”和“政治公信力”，打乱了“战略外交”的实施。

^③ 况且，日本越来越怀疑，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中美战略交易能力的同步增长，美国在保护日本上能否真正靠得住。

联外交、环绕外交来制约中国的崛起，以对冲对日本带来的权势变动和不利影响。并且，日本认为此处大有文章可做，利用不利于中国的体系性、结构性因素（美国防范、周边警惕、意识形态非主流等），推动多边的外交串联活动能够奏效。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长期性的大战略，并非单纯依靠自己的军事发展或日美同盟，而是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利用一切矛盾、联合广泛力量，以体系制衡和结构压迫的形式来全面应对中国的崛起。只要中国在国际及地区层面不断受到并始终难以真正摆脱这种制衡和压迫，那么日本在与中国的对垒和抗衡中就拥有了强大的后援，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这就是安倍“战略外交”中的对华“战略精髓”之所在。

在这一“顶层考量”的规范下，安倍“战略外交”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无疑正在造成一定的具体影响和干扰。

（一）总体上加大了中国崛起的困难系数

很少有国家像安倍政府这样，执着而精心地将不利于中国崛起的负面因素加以串联和运用。原来一些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因素，是点不是线，是线不成面，美国对此想搞整合却有心无力、有力无钱，日本的跟进、辅助与出资买单可谓是“适时”地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有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岛争问题的存在，安倍内阁在这方面有时比美国还要热心、积极和周到。例如，围绕岛争，着力发起对外舆论战，渲染中国“威胁”，一度对中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造成损害；不断强化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外交攻势；与印、澳、欧加强战略协调，共谋增强对中国的战略平衡和牵制能力；与俄、东盟的互动对亚太地缘格局和大国关系产生复杂影响，等等。总之，当前安倍对华战略总体上加剧了涉华国际博弈和大国角逐，对中国的内外各方面工作形成很多干扰和考验，成为中国顺利崛起的一大扰乱因素。

（二）对冲中国外交布局及基础

安倍政府通过推动“战略外交”，对中国外交政策活动刻意实施跟进盯防、围追堵截。安倍“战略外交”的对象，很多是世界重要地区及国家，也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工作对象，是较为关键和基础的部分。安倍式的“合纵连横”有可能损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关系。例如，安倍政府利用第五届非洲发展会议，全面加大对非投入，还对中东能源产地重点展开访问攻势，其内阁政要多次出访中东各国。这些举措对中国形成一定战略压力。安倍对东南亚的大力拉拢和苦心经营更是其外交的重中之重，一年之内穿梭出访该地

区所有十国，12月还举行日本东盟首脑特别会议，对介入东盟事务异常热心，力图抢抓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主导权。安倍还希望能在中俄之间制造矛盾，打进展子，动摇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础和依托，为此，在11月推动举行首次日俄“2+2”会议并对其意义高调宣扬。安倍对印度的拉拢也是热心有加，不仅政府要员接连访印，还一反“常态”，积极推动12月日本天皇实现战后首次访印。

（三）严重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宏观上，安倍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发挥组织者或串联者的角色，意图在中国周边编织针对中国的安全联盟和“统一战线”。这种联盟，有被安倍和麻生称为“民主安全菱形”的日美澳印四国同盟，也有作为“民主国家同盟”的日美澳、日美印联合。而当前中国周边热点问题升温，挑战增多，安倍政府趁机上蹿下跳推动“安全外交”、“防务合作”，插手争端，在周边特别是海洋和空域方面，针对中国搞煽风点火、制造麻烦、放大矛盾，不但在各种场合以“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维护航行自由、维护飞行自由”为名，呼吁东盟等国家紧密联系、共同牵制中国向外“扩张”^①，还直接以加强地区防务能力为由，向菲越等南海岛屿声索国提供装备援助，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再就是以中国为重要针对目标，加强日印安全合作，尤其是加大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投入。^②而且，通过一般性的安全对话机制，与柬、老、蒙等中国近邻进行安全磋商，离间并破坏中国与近邻国家之间的互信。

（四）对中国对外经贸形成竞争和挤压

安倍政府积极推动 TPP，目的之一就是将来在对华经济竞争中占领制高点，主导规则制定，继续获益得利。出于政治目的和战略考量，安倍政府还劝诱经济界实施“中国+1”工程，鼓动对华撤资并转向其他地区和国家进行投资。安倍上台后，大力推动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大对东盟、非洲等国家的经援力度，官民一体推动日本对外投资及贸易活动。例如，2013年11月，安倍内阁决定拨出2000亿日元设立一家新国营公司，专门支援日本企业

① 典型事例有：2013年9月，日本召开日本东盟13国海洋会议，提出反对改变现状、维护自由航行、和平解决争端等倡议；10月，安倍出席日本东盟首脑峰会（10+1）时，呼吁东盟各国紧密联系，共同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

② 2013年12月，日印海军首次在印度洋举行军演，其意之一被认为是牵制中国。参见：『読売新聞』2013年12月23日。

出口基础设施以及投标亚洲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新马泰越等国的铁路工程已被列入其中。这些合作项目多是中国优势部门，例如道路、桥梁、高铁、电力工程等。这对于中国企业及外贸走出去开拓市场、发展合作，形成较大挤压。

四 政策性思考与评估

当前，中国在崛起中面临着两大结构性的障碍：一是与西方主导秩序之间的矛盾，二是尚缺乏牢固可靠的周边战略依托。日本在这两大结构性障碍因素中起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日本是不愿看到中国顺利崛起，并以行动来实施这种意愿的少数国家行为体。并且，由于其自感面对中国崛起的压力的巨大，采取对策上有时甚至比美国想得更“周到”、做得更积极。在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中，日本既是麻烦制造者，亦是煽风点火者。日本在中国外交运筹国际、经营周边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日本问题”的处理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连锁作用，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是否具有说服力的试金石。为此，中国在对日战略上应积极运筹，做好如下一些应对工作。

（一）保持战略自信与定力，避免随日而动

对于安倍的“战略外交”，中国应保持战略自信与定力，不被牵着走。这来自于如下理由：从日本国内因素看，日本政局不稳，战略政策缺少连续性和系统性。安倍之后能否维持如此高调的对外政策，还很难说。况且，日本经济低迷、债务高筑，“日元外交”全部兑现颇有难度。另外，日本国内和平宪法等的限制，对如日印和日土等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就有制约，所以虽然双方首脑非常积极，但也未能如期取得突破性进展。从外在因素看，日印、日非、日俄、日蒙、日缅等的经贸往来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中国在这些地区和国家的影响力较大，尤其是中国在欧亚大陆具有地缘优势和历史积蓄。日本对外关系的深化拓展仍面临不少制约或不利因素。而日本“战略外交”的对象国——除极个别国家外，即使少部分有联手日本平衡和制约中国的意图，但绝大部分还是独立自主外交，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在大国外交和国际博弈中争取利益最大化，要日本的好处但不会以牺牲对华关系为代价，竭力

避免选边站和非此即彼，不会为日本所用而火中取栗。^①

（二）因地因事制宜，有针对性地防遏不利影响

中国需密切关注日本战略性外交动向，警惕安倍编制反华包围圈。对日本“打楔子”、“挖墙脚”、“掺沙子”等外交举动要有跟踪和关注，不可掉以轻心。对其举动，中国要有针对性地主动巩固和发展对外关系，争取在中日及第三方的关系格局中保持战略主动，必要时针对性地对日本的“小动作”进行反制。在多方势力交织和对峙的重要地区，中国应加强博弈，舍得投入，以有效阻滞日美势力的介入和深入。此外，对印、澳、欧应着眼大局，从战略上拉住和稳住；对非洲应落实好合作举措，保持好强劲合作势头，提升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要增加合作新领域和新潜力。同时，有些还需要提前布局，完善预案，如需要打造中邻经济合作升级版，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冲日本的相关经贸动向；需要统筹中非关系与安理会改革问题、亚太与印太的中日印美关系等。同时，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割裂其“战略外交”的“纽带”部分。例如，利用安倍“参拜”行径，揭露其“价值观”的虚妄性和矛盾性，使其“价值观外交”在国际社会丧失公信力，难以成立。

（三）选择性地借鉴日本已有的一些成功做法

安倍内阁的对华战略外交动机不纯，方向错误，但在战术及做法上，并非一无是处。中国宜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借鉴其成功经验和做法，在坚持既其特色和优势的同时，采取实用主义的观点选择性地“拿来”，为我所用。例如，对日本推行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模式、企业海外开发协调机制等做法，中国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加以跟踪研究；还应统筹国内有关部门，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作模式，认真研究和完善政府对企业的政治支持、资金扶持和安保机制，免除企业后顾之忧，支持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亚非发展中国家应加大维和及安全事务的建设性参与，加大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力度，推动建设中邻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的非洲外交经验。日本对非外交是援助、投资、贸易等多重手段并用，同时更加重视调动非政府组织、企业界和民间力量的积极性，政府为进军非洲的日企提供更多融资、保险和安保等支持，以利打造“以官带民、重视草根、官民合

^① 澳大利亚的立场堪为其中典型。尽管安倍上台后对澳进一步拉拢，但其外长鲍勃·卡尔在2013年3月仍表示“安倍的日美澳印四国同盟容易招致中国误解，不能赞同”。参见《联合早报》2013年3月25日。

作、相互促进”的对非合作格局。^①

(四) 以“全球再平衡”应对其“战略外交”

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呈现“东急西缓”、“北稳南乱”的局面,中国在西太平洋方向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明显加大。日本及日美军事同盟合作围绕钓鱼岛及第一岛链,着力在太平洋方向对中国施压,中国面临其岛链封锁及军事威慑。这种局面对中国国家安全和顺利崛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相比之下,当前,美国面临成堆的国际国内难题,与中国相反,是“东缓西急”、“内急外缓”,“管理”世界时往往有心无力,分身无术。所以,中国应对日本“战略外交”的全球攻势行为时,可以做如下大棋盘考虑:

1. 稳定并搞好大国关系。例如,保持与美的良好沟通和合作,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必要时可与美国进行重大利益交换;增进与俄的良好协作关系;战略上稳住印澳等。以此,减少总体外交战略资源的分散和损耗,使日本难有大的战略作为余地。

2. 以“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为契机,积极经营周边。一是经略南海周边,做好东盟工作,增信释疑,减少日本可乘之机。二是落实西进和南下(前出印度洋)战略,建设新陆海丝绸之路和经济走廊,进一步构筑互惠命运共同体,夯实周边战略依托带。三是适当借助俄韩等牵制性力量。中俄传统友谊深厚,日韩处于矛盾尖锐爆发期,而俄韩与日本都有领土争端。以历史问题和战后秩序为抓手,适当联合俄韩,可起到牵制日本的作用。

3. 应积极推进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创造中日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加两国共同利益,在地区共同利益的大背景下软化和弱化两国矛盾的影响。

4. 在以上工作基础上,挑选适当时机,集中精力和资源,处理和解决双边海洋争端问题。

^① 另外,中国无法阻止日本以外交的名义进行“环绕”活动。中国可本着以我为主、趋利避害原则,视情况及具体领域开展与日协调,可在多边合作框架下开展一些低敏感领域的合作,以抑制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和破坏性,同时争取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The “Strategic Diplomacy” of Shinzo Abe and Its Impact on China

Wu Huaizhong

Since taking offic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s endeavored to advocate the so - called “strategic diplomacy” with the view of “overlooking the globe” . In the context of profound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situation and adjust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Abe’s “strategic diplomacy” aims at promoting politics, economy and defense of Japan, as well as containing and counter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strategic diplomacy” is to be achieved by various forms of diplomacy, such a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defense, social and cultural ones, by means of strengthening ties of shared values, expanding economic aid, promot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social contribu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p - level design, comprehensive planning, global view, expanding oversea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US and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A large part of strategic diplomacy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surrounding diplomacy” directed against China, which has influenced the interes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erms of strategic, diplomat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aspec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a comprehensive way, fully using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respond calmly and properly to foster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avoid unfavorable ones for implementing its foreign strategy.

安倍の「戦略的外交」及び対中影響について

呉 懷中

再び政権についた安倍首相が地球儀を俯瞰する「戦略的外交」を展開してきた。この外交は、内外情勢の変動や日本の戦略調整を背景とし、国際秩序維持・政治・経済推進・安全保障や中国牽制を主要目標として、政治的外交・経済外交・安全保障外交・社会文化外交を実行アプローチとし、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価値観外交、経済提携、安全保障協力や社会的貢献を具体的実施方法とするもので、トップダウン性・グローバル性・日米協力・日本と諸外国の双方向交流などの特徴を有している。この「戦略的外交」の多くは中国に対して展開された「包囲外交」だと思われ、既に戦略、外交・安全保障や経済などの面において中国の発展や安全保障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中国は国際的視野をもって、二国間や多国間のアプローチによる多種多様の対策を講じるべきである。

(责任编辑：林 昶)